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美] 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口述/订正

[美] 桑多兹 Ellis Sandoz ● 访谈/实录/编辑

自传性反思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徐志跃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主编



自传性反思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美]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口述/订正

[美]桑多兹 Ellis Sandoz | 访谈/实录/编辑

徐志跃 | 译

林志猛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传性反思/(美)沃格林著;徐志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7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5264-9

I. 自… II. ①沃… ②徐… III. 沃格林, E. (1901~1985) - 政治哲学 IV. D09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533 号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by Eric Voegeli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lis Sandoz

Original Copyright ©1989

B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and control thereof purchased September 1998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3426

自传性反思

[美]沃格林 著

徐志跃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09年7月北京第1版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7.125

字 数:170千字

定 价:2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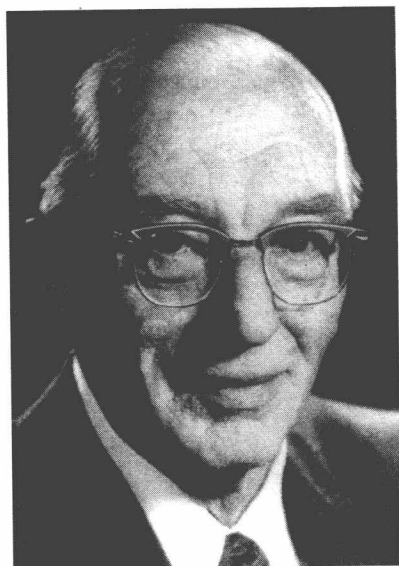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沃格林 (摄于1980年)

In consideratione creaturarum non est vana et peritura curiositas exercenda; sed gradus ad immortalia et semper manentia faciendus.

在对造物的研究上，一个人不应施展无用的和会朽坏的好奇心，而应该上升到不朽和永存的事物。

——圣奥古斯丁，《论真宗教》

中译本说明

《自传性反思》可谓沃格林的一幅思想地图。在这部由口述整理而成的著作里，沃格林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描绘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研究。从群星荟萃的维也纳大学，到美、英、法诸大学，沃格林在游学中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其间的种种细节扣人心弦。1938年，沃格林巧妙躲过盖世太保的逮捕，移居美国。

能运用十几种语文——甚至可以从我们中国的红色样板戏中识别出周代的歌词，沃格林这位魅力型教师的课堂，让无数学子心驰神迷。不过，要进入沃格林的研讨班，门槛可不低：至少得掌握一门古典语文（希腊语或拉丁语等），能流利阅读德语、法语和英语（根据研究领域的要求，有些还得掌握别的语文）。显然，沃格林对学生的要求源于对自己的要求：为研究古希腊经典、俄国政治、中国政治等，沃格林分别学了相应的语文。在这部自传里，沃格林展现的学习精神令人敬佩。

作为政治哲人，沃格林从教50年，留下34部著作，但始终关注的是政治的秩序与无序问题——他眼中的“根本问题”。由于亲历过纳粹统治，沃格林对意识形态极为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沃格林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苦涩经验”而落入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许，这应归因于对“柏拉图处境”的思索：基于身历无序的经验追问真正的秩序（参见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编者导言，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页3,10）。正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促使沃格林不断“反思”。在写作《政治观念史》时，沃格林意识到，“观念

2 自传性反思

史”是个不恰当的概念，自己对政治观念史的先入之见在理论上并不恰当。为此，沃格林“彷徨”五年，逐渐认识到，政府执政的关键不在于代表的选举和程序问题，重要的是要能实现如下“根本目的”：保障国内和平、执行正义、关心人民福祉等等。沃格林对“代表”问题的认识与施米特如出一辙——国王在上帝面前是人民的代表，在人民面前是上帝的代表，“生存的代表”需要“超越的代表”来补充。一个与意识形态搏斗的人能作出这样的反思，实在令人惊讶。

无论沃格林对“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否透彻，强烈的反思精神一直在推动他走向思考的纵深。值得我们这些习惯于“怀疑”和“批判”的智识分子们好好学习的是：沃格林并没有止步于自己早年获得的立场或观点，而是紧紧抓住“根本问题”，在思考之路上勇于改弦更张。“怀疑”和“批判”并不仅仅是对外的，更重要的是指向自身——反思自己的思想结构，促使问题持续深化，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没有推进，以为凭靠一点儿逻辑思辨的推理就可以解决所有复杂的思想或政治难题，甚至自负地宣称，沃格林或施米特的思考“过于天真”。

在沃格林勾勒的这幅思想地图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种种风貌：象征、意识、秩序、历史哲学、神显、实在、经验……这些勾勒是预备性的，为我们进入沃格林的相关著作提供了门径。要进一步深入这些问题，只能按图索骥，回到相应的文本。这幅地图可使我们不至于在沃格林的思想迷宫中迷失方向。

林志猛

2009年8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全集版编者导言

《沃格林全集》最后一卷包含沃格林的《自传性反思》（根据1989年版本重印，增加了少许注解），“沃格林著述中的术语表”（含简释），本卷索引和全集累积索引。^①累积索引不涵盖《政治观念史稿》（全集卷二十六本身包含了《史稿》累积索引），卷二十九和卷三十是书信全集当然也不包含在内，因尚在制作中。^②

我并不试图作全面的注解，只是就《自传性反思》中的对话性质的讨论议题，指出一些线索，让读者了解《全集》各处，沃格林对这些议题更为技术化的和更为充分的关注。鉴于《自传性反思》是在1973年实录的，这些线索有助于填补一些细节，尤其是对于其后的一些出版物的寻索。当然，富有说服力的叙述自成一格。同样的方法也可见于术语表，由尤金纳·魏伯（Eugene Webb）辑录，我做了补充。我们并不声称这是一个完全的沃格林技术性术语列表——他本人是极富成就的使用多种语言的人，能运用十多种语言，他的词汇有时候被视为理解上的绊脚石——因此，术语的选择，[1]其定义和例示来自沃格林的著述，尤为关

① [译按] 中译本不含术语表和累积索引，书末索引不含术语表的条目。

② [译按] 卷三十已经于2007年出版。

2 自传性反思

注希腊词汇。这是希望，特别是新的读者将发现，这两份文献有助于他们在阅读沃格林其他著作时有深入的理解。本卷还包括《全集》累积索引，系统地包括姓名、主题、观念、著述和术语，为学者进入《全集》的整体内容提供了便捷通道，也为任何对沃格林全部著作的严肃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帮助。

本版的每一卷都包括由编者撰写的学术性导言，提供了洞见和评论。八卷《政治观念史稿》（全集版第十九至二十六卷）还另有总导言。本卷还有我在2005年稍加改写和扩充的《自传性反思》的导言。这些导言，如果汇集成册，本身就构成对沃格林从1921年开始直到遗著《求索秩序》^①的工作的技术分析和评论。

对转向这些出版物的任何人来说，沃格林作为伟大学者的工作的范围之广和意义之深，都明摆着。然而，在全部这些著作中很少显示的，则是沃格林作为教师——他是一个超级教师——的明证，主要的例外就是《自传性反思》中几页内容。我们曾尝试填补这一空隙，为此在第二十届沃格林协会国际会议专门开设一个圆桌会议。^②但是，既然沃格林在长期职业生涯中是作为教师来谋生的，而在他所有的工作中极为有意地追求授业和解惑，同时也寻求发现和[2]知晓，因此，在这里稍稍谈点他作为教师的教学法和人格，读者也许会感兴趣。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第一次遇见沃格林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那时候，我是一名本科生，选修了他的一门主课，面

① 《秩序与历史》卷五，1987年出版问世，收入《全集》卷十八，2000年版。

② 该届沃格林协会年会以“大师级教师沃格林”（Eric Voeglin as Master Teacher）为题的讨论组论文可以在下述网站查阅：[www. cricvoegelin. org](http://www.cricvoegelin.org)。

向三四年级的“政治理论研究”，然后一路读下去，并在他的指导下写出硕士论文。自从第一堂课起的十五年之后（我在美国海军将近三年，加上有两年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我又继续在慕尼黑跟着他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从在路易斯安那和在慕尼黑这样的经验，我可以这样说，沃格林博士在课堂上是令人钦佩的、引人注目的人物——不论是大课，还是讨论课。讲课引人入胜，他从不照本宣读，通过脱口而出的扼要提示和提纲，复杂的材料被十分有力而清晰地传达出来。每堂课似乎都有其特殊的时刻，通常有一种探险感，即，伴随着一场知识探险，进入未知海域。沃格林的课堂上不会庸常，正因此，他吸引了全校各系的学生和旁听生，以及社会上的公众。他的硕士生（那时候，路易斯安那大学还没有博士生）讨论课一般晚上在他贝顿罗格（Baton Rouge）的家里进行，女主人（丽希·沃格林）则在一旁聆听，每当休息之际，她总会端上茶点。我记得有一次讨论课是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十一章。在这一学期的讨论课中，我们每次课的前半段时间是一句句研读，沃格林对照希腊文原文来核对译文，并校正、修改和讲解文本。在每次的下半段时间，学生表述围绕所分配的其他种种课题，并进行讨论。我在慕尼黑参加的第一个讨论课也按照类似程序进行，细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并逐行讨论。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他在《秩序与历史》卷三《城邦世界》^①中给出的分析里，有个解释观点是错的，并说在该书下次重印时要修正。在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大学（Ludwig - Maximilian - Universitat），[3] 研讨班更大更正式，一般是在沃

① 全集卷十五，十一章三节。

4 自传性反思

格林 1958 年担任教授职位时建立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进行。

先概括一下：沃格林要求学生的注意和尊敬，他把自己呈现为知道本行当的内行。他基于一个坚定的确信，即，古典希腊哲学是政治科学的根基：讲课材料是从这个一贯的起点来呈现的。对真理的献身，和向学生沟通真理的意欲，在每堂课和每个讨论中显明出来，并伴随着问题的探究，这种探究始终反映出，朝向实在之神性根基的张力乃是探索人之条件和政治议题的决定性背景。向着实在之地平线的开放感，拒绝截去实在的顶端，或者说，拒绝与任何种类的简约主义的建构走在一起，鼓励学生用充分的资源投入到对复杂多端的材料的研究，并使学生在讨论中成为伙伴，而不仅仅是吸收冷漠的信息的观众，这反过来鼓励学生在理解艰难的材料时同情性地把他们自身的常识、智力和信仰经验卷进个人的反思意识。这某种程度是基于苏格拉底的“看看、想想这是否不是实情”的模式——即，经由个人的理解和质问来证明分析性话语。

因此，某种程度上，沃格林和他的课堂其实是在做他所教的“科学”，不论是在讲课中还是在研讨班中，并且，每个人都知晓，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学生和课堂是说服性探究的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赞为对真理——对重要真理——的一种追求。我认为，在有价值的探究活动中的这种易察觉到的参与感，加上他生动的幽默感，也许是沃格林作为教师和讲课者，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和吸引人的主要源泉。

若如此理解的话，加上我前面提示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学”处在非常接近沃格林工作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在出版物中，而且也在广泛的讲学中。正如他 1972 年在塔夫兹大

学弗莱切学院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慕尼黑政治科学研究所的]基金会提供[给我]建立[4]政治科学的机会，从外部，又在当代科学的水平。我们可以避开描述性工具主义，历史实证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左右意识形态意见的常规镇重物……有可能建立这样的课程设置，其核心课程和讨论课围绕古典政治学，并强调洛克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英美政治学。”^①

沃格林的教学方法坦诚地沟通他的思想的默想性根基。“上帝”不是一个脏词，他经常向他的听众（尤其是更为意识形态头脑的慕尼黑学生）强调，“科学”是被“经验和理性”控制的——并且，你不能走到“启示的背面”，并佯称它（即，领悟的灵气经验）从来没有发生。在他教学达十六年之久的路易斯安那，“信仰”之经验性根基是更为可见的。^②事实上，他总是以多种多样的方法在讲述“不朽的拯救故事”——这出于一个确信：超越经验对人之为人的生存来说，是根本性的，这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也是一再强调的。这既不是“从宗教角度”，也不是从枯燥乏味的假设出发来论证，而是从科学上以经过批判性确认的历史事实基础为支撑，并与所讨论的诸般主观要事构成整体。一个教授（professor）总被期待声称（profess）某种东西，那是就他对此所知而言的不动感情地确肯的真理——沃格林是这么想的，也一直这么说。这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心智健

① 全集卷三十三《人性的戏剧和其他未刊论文，1939-1985》，页348。

② 参库珀（Barry Cooper），《沃格林和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Eric Voegel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第一、二章，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参：安布瑞（Charles R. Embry）编，《黑尔曼与沃格林：书信中的友谊》（*Robert B. Heilman and Eric Voegelin: A Friendship in Letters, 1944-1984*），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4。

全”，即科学的客观性的核心之所在。

他在讲课中有效地使用写在黑板上的简图；一般总是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轻松在精神上是苏格拉底式的：他常常会说，我们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在这里对它们的讨论也许并不非常重要。不过，在具体场合的限度内，他的目的显然是[5]严肃的。办公室接待学生的时间是被非常严谨地遵守的，但学生不太愿意待得比他们解决不得不问的问题所绝对必要的时间更长。有点诙谐意味的是，用无关紧要的问题占据这位教授的时间，他们或许在妨碍文明本身的进展。

对待本科生温柔一点，这是规则，并且打分也相当慷慨，但是，对于那些懒惰的笨蛋，要是让沃格林碰到，可就倒霉了。他评论说：“我这辈子一直不得不在讨论课伊始就向学生说明：根本没有一种叫做愚蠢的权利的东西；根本没有一种叫做文盲的权利的东西；也根本没有一种叫做无能的权利的东西。”^①他在论辩中也极具摧毁力。假如你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却又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么，你在公开的讨论中就只有求老天帮忙了。

在路易斯安那大学较早的一代学生中，哈福德（William Harvard）先生回忆过当时的印象。他在本科两年级开始上沃格林的课，最终成为行政系的系主任。他写道：

作为一名教师，沃格林从来不炫耀才气；他的影响纯然基于渊博学问和分析能力。假如一个人恰好站在他的实际语言可以得到理解的界限之外，那么，他的讲课听起来也许就

^① 全集卷三十三，页419。

单调乏味了，因为句子的流动加上缺乏抑扬曲折就可能构成要命的均匀性，要是碰到某个比沃格林更不会激动的人，也就可能是死气沉沉了。我先是作为本科生，后来是研究生，再后来是年轻同事，坐在他的课堂和讨论班上，而每当我听到同行内的同事诋毁地说他“傲慢”或“严厉”，我总是惊讶不已。我总是在他身上发现，他对学生超常的体谅，对他们理解上的问题非常有耐心，在评分问题上也是心慈手软。在指导研究方面，就像人们可以想到的那样，他是一个准确的评论者；但他对他的时间和思想，是非常大方。他有一种淘气的幽默感，常常是由于他德语口音出乎意料地冒出来的。^① [6]

对于沃格林在慕尼黑的教学来说，非常幸运的是，有根据录音整理的主要文件，他的“政治科学引论”，出版时作《希特勒与德国人》。^② 这是他1964年夏天所做讲座的录音稿，它显然是毫无先例的政治科学引论。此处我无意对这些讲座作分析或者概括，既然对任何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该书很容易获得。但人们可以赞同该书编者的主张，即，这“毫无疑问是慕尼黑大学人文教师中最为惊人的课程”。理由容易确定：“对他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就像他们中的一位事后描述的，‘它是他们经历的德国教育的顶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如此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

^① 哈福德 (William Harvard), “沃格林之历史和意识概念的变迁模式”, 《南方评论》, 第七期 (1971), 转引自桑多兹《沃格林革命》(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第二版, 2000年, 页75。

^② 全集卷三十一, 另有平装本, 中文版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8 自传性反思

真相的教师’”。^① 这些讲座之影响力的主要理由是它们的沉思维度，正如该卷书编者说明的，这里，沉思的具体含义在于：唤起对部分被擦掉的、部分被拒绝的生平经验和历史经验的记忆（或 *anamnesis*，回忆；既往），那些经验旨在隐瞒自身。

讲座的方法是既往性的，其意义在于克服“在人的当前生存中对秩序之起源、开端和根基的”遗忘。在讲座中，这种既往性努力采取不同的形式：重新唤起哲学的和启示的洞见，面对根本性的忘却（聪明的或不聪明的），把大量新近确认的历史材料提高到理论的相关性。而原则和无序的数据资料之间的互动还相关性地加深了既往性沉思本身。^②

编者正确地总结道：“沃格林作为政治哲学的教师也许可以被视为根植于他自身承担见证的人生”。^③

爱理斯·桑多兹 [7]

① 同上，页1-2。此处是海宁森（Manfred Henningsen）的话，他是沃格林当时的助手之一，后担任夏威夷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② 同上，页29，内引自沃格林，“意识和秩序”，《既往》“序”（全集卷六）。原刊《逻各斯》（*Logos: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第四期（1983），页22。

③ 同上，页34。另参桑多兹，《沃格林革命》，页47-70。